

思想漫谈

坚决防止“两面人”现象

□ 秦晓宏

党的十八大以来，绝大多数纪检监察干部认真履行职责，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了贡献，纪检监察机关的影响力、权威性，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提升。但也正是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权威性，让一些纪检干部心态扭曲，感到自己“牌子”响、身份高，说话办事力度大，于是忘记了进入纪检队伍的初心，在行使监督权力时搞起了邪门歪道，以权谋私、言行相悖。针对这种“两面人”现象，中央纪委“刀刀向内”，坚决“清理门户”，把纪检队伍中的“害群之马”坚决、及时揭露出来，真正体现了中央纪委贯彻从严治党从自身严起、严防“灯下黑”的一贯要求，为全党全社会树起了严格自律的标杆。

反腐败斗争的实践证明，打铁还需自身硬。在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中，“两面人”的下场也警示我们，纪检干部只有始终以最严格的要求约束自己，按照忠诚、干净、担当的根本标准淬炼成钢，才能担当起党赋予的神圣使命，经受住复杂环境的考验。

坚定理想信念，涵养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修身立德是为政之基，从不敢腐、不能腐到不想腐，要靠铸牢理想信念这个共产党人的魂。面对公和私、义和利、是和非、正和邪、苦和乐的矛盾，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靠的就是觉悟，最终检验的是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纪检监察干部战斗在反腐倡廉第一线，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必须讲觉悟、有觉悟。因此，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纪检监察干部要按照《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坦坦荡荡生活，坚持以信念加实干立身，把真理力量和人格力量统一起来，做一名让党放心、人民信赖的纪检干部。

严格执行纪检监察规章制度，自觉接受监督。一段时间以来，“两面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某些角落里大行其道、有恃无恐，一些人借此屡屡得手、步步高升，背后的深层原因，就是利用制度规定上的某些漏洞，避开了各方面的监督。在不少单位，对纪检干部的监督存在着“上级很难管，同级不好管，下级不敢管”的现象，“谁来监督纪委”成了公众的一个疑问。防止“灯下黑”，就要把制度立起来，让监督严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敢于坚持原则，完善配套措施，推动问责制度落地生根。”这次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紧扣监督执纪工作流程，明确请示报告、线索处置、初步核实、立案审查、案件审理、涉案款物管理等工作规程；规定谈话函询的工作程序，执纪审查的审批权限，调查谈话和证据收集的具体要求；提炼有效管用招招，上升为制度规范，把纪委的自我监督同接受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有机结合，确保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不被滥用。这一系列规则的制定，是纪检机关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落实全面从严治党部署，带头强化自我约束，把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是严格自律的担当精神的具体体现。纪检干部特别是居于领导地位的“关键少数”，只有严格执行这些规定，主动接受党内外各方面的监督，自觉将监督执纪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能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坚守职责定位，以更加忠诚干净担当的行动，交上让党和人民满意的优秀答卷。

治理和消除“两面人”现象，一定要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规范，是我们党自我革新、自我净化、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七次全会上强调：“要坦诚相见、开诚布公，让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让党员、干部习惯在相互提醒和督促中进步。”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经常性的提醒、约谈乃至轻处分，应该是纪委工作的重头大头，而立案查处只能是多种处置方式中的极少数，这为抓好经常性的党内批评提供了依据。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的过程，谁都不是从一开始就堕入严重违法深渊的。因此，党组织发现干部身上的苗头性问题和及时提醒提醒、敲打敲打，请他向组织作出说明，或者在民主生活会上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都是对干部真正的爱护。这种“党内政治空气的清洁剂”，可以让党员干部心有敬畏、行有所止，让有问题的干部知错就改，没有问题的受到教育和警示，正所谓“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长此以往，就能营造出从严治党的良好氛围，让批评与自我批评真正发挥作用，形成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从而把纪检队伍锻造成一支行一致、有诺必践，威信高、战斗力强的队伍。

（作者单位：海南省白沙黎族自治县）



扫描二维码
关注“海南观察”
“码”上读懂海南

投稿邮箱：hnrblb@163.com

A05 理论

为什么是“十四年抗战”

□ 于洪卫

“十四年抗战”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民群众在抗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理解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意义，理解抗日战争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近日，有关部门提出要在教材中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曾经一段时间，人们习惯了“八年抗战”。但随着抗战研究的深入，“十四年抗战”的概念逐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乃至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六十周年、七十周年的大会讲话中，都把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把十四年的抗战作为一个整体。国内较早的有代表的抗战史著作，如军事科学院编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国防大学何理教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中央党史研究室王秀鑫和郭德宏主编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张宪文教授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等，都是以十四年抗战作为研究框架。

“十四年抗战”概念的提出并得到广泛的认可，是有着充分依据的，它可以使人们更准确、全面和科学地认识中国的抗日战争。

首先，“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的判断。

以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为依据，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的一条重要原理。而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折点。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处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入侵中国，独占中国东北并逐步向山海关内进逼，企图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从而加深了日本与其他帝国主义之间

的矛盾，也使得日本和中国的矛盾在各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中突出出来，中日矛盾迅速成为中国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九一八事变后，不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爱国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甚至军阀，对日态度也开始发生重大改变。国内各种矛盾逐步降到次要和服从地位。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国民党营垒中一部分爱国志士如马占山、蔡廷锴、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纷纷投身抗日斗争，成为重名一时的抗日风云人物。

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使团结御侮、抗日救亡成为全民族的强烈要求。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积极引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不断调整政策，从“抗日反蒋”发展为“逼蒋抗日”“联蒋抗日”。1936年12月，被逼“剿共”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发起“兵谏”，要求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其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着眼于中国抗日战争的整体性的考虑。

“十四年抗战”概念，是把前六年的局部抗战和后八年的全国抗战作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分来看待的。作为侵略方的日本，并没有把七七事变前后对中国的侵略分开来看待，往往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做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这段历史叫做“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到七七事变前的六年时间里，虽然中日两国政府没有正式宣战，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两国军民事实处于一种“战争状态”，只不过这种抗战处于一种局部而

非全局，但这并不能抹杀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事实。

前六年的局部抗战是中国抗战重要组成部分。自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略东北的第一天起，东北军民就进行了英勇的武装抵抗。由东北军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学生、爱国知识分子甚至部分爱国绿林英雄组成的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拿起武器抵抗日本的侵略。仅半年时间，东三省抗日义勇军总数就发展到30多万人。在东北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据不完全统计，仅1932年抗日义勇军就袭击辽、吉两省重要城镇30次，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今丹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配合了全国救亡运动的开展。在东北军和义勇军相继失败后，中共直接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成为东北抗战的主体。因此，九一八事变也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

日本侵占东北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军民的局部抗战也没有局限在东北。1932年，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侵略，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蒋光鼐、蔡廷锴率领第19路军，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三易主将，数次增兵，死伤逾万，使其受到九一八事变以来最沉重的打击。在占领东北后，日本还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及关内地区。从1933年起，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先后侵占热河和长城及其以南地区，以至于“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驻守长城防线、察绥地区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长城内外的义勇军，激于民族义愤，先后进行了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及绥远抗战等。华北

危急，由北平青年学生开启的一二·九运动迅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这一时期，抗战时期著名的《大刀进行曲》也是为歌颂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大刀队”而作。

因此，“十四年抗战”不是否定“八年抗战”，而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的肯定，是对前六年局部抗战中中国军民出生入死、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肯定，更是对牺牲在战场上的抗日英烈的应有尊重。

再次，“十四年抗战”概念是对抗日战争人民性的充分肯定。

受传统习惯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政府宣传战作为敌我双方交战的开始，并以此作为“八年抗战”的依据。但这忽略了另外一个事实，即当时国民政府正式对日宣战的时间不是在七七事变后，而是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1941年12月。作为一场反侵略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与两国两军间的普通战争有很大不同，这是一场弱国反抗强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这就决定了抗日战争不是一场简单的政府和军队之间对决的战争，而是一场由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并发挥了巨大力量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促进民族觉醒民族团结的战争。人民群众由战争的旁观者跻身于重要的参与者，人民性是这场反侵略战争的独特特性。这决定了抗日战争的进程不是由军队的一两个大的作战行动所决定，而是由人民群众的动员和参与程度来决定的。因此，在界定抗日战争的起点问题时，就不宜单纯以政府是否宣战作为“标准”。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局部抗战的六年中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把精力主要放在“剿共”上，极力压制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甚至调集十几万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进行围剿破坏民众抗战，还捏造罪名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等救国会领导人，造

观点摘登

四大动力缺一不可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日前在腾讯学院演讲中指出：不论是科学发现、技术发明，还是产品设计制造，还原到行为的动力，就是《富足》一书里提到的四大动力。

第一个动力是好奇。这是人的天性里头就有的，人是万物之灵，天生就有这个偏好。第二个动力是财富。开发一个产品、开发一个技术，或发现一个原理，如果可以带来财富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普遍且强有力的动力。第三个动力是“恐惧”。罗斯福为什么搞曼哈顿计划？因为恐惧——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弹，二战命运可能是另外一个模样。其实军备竞赛既是经济竞赛，更是科技竞赛，这是推动科创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硅谷还有波士顿创新面对的需求，并不仅仅限于市场需求，还有国防需求。第四个动力叫人生意义。这就比较讲情怀，人生要有个意义，要给世界留点有意义的东西。

科创发力，哪一个动力也不能少。科学发现从根本上由人类的好奇心支撑，但科学家也要吃饭、生活，实验要有设备，在还没发现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这就需要财富。至于所谓的“恐惧”，其实是群体、国家之间竞争的派生物，其直接出发点并不是创造财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慑，尽可能拥有人无我有的杀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项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总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义，希望给世界留下有价值的贡献，其中就包括发现与发明。

这四大动力，或强或弱，在哪里也总是有的，不过受具体条件限制，动力的配置、发挥、组合的状态有所不同。

海南教育资源均衡配置需理顺五大关系

□ 段会冬

智库建言

自2011年海南省政府同教育部签署《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备忘录》以来，我省正式启动了推进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尽管在资源均衡配置的攻坚战中，大量的资源已然投入到资源薄弱的地区与学校，但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资源配置是一个从科学研究到最终决策的系统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要理顺资源投放中存量与增量、动态与静态、孤立与合作等关系，还必须理清从资源投放到发生效用的转化过程。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我省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改善，力求不断提升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研究与决策

教育资源配置是一项系统工程，它需要依托于科学的统计与严谨的预测，而这部需要科研力量的介入。同发达国家和发达省份动辄数十位专家参与教育规划和决策相比，我省在借助科研力量进行资源配置等方面决策的经验上尚有较大差距。可喜地是，随着省级教育主管部门对于科学规划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包括澄迈在内的部分市县已经意识到借助高校等科研院所的力量进行教育发展统筹规划的重要性。因此，在全省范围内提高教育资源决策者的数据意识、规划意识、研究意识是至关重要的。

先进地区的成功经验表明，通过课题研究、数据库建设等渠道加大高校等科研机构的介入力度，是教育资源配置决策科学化的重要举措。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科研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一方面应当在课题的设置等工作上突出“提前”观念，引导科研工作者着眼于全省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另一方面应当设立或委托专门的研究机构从事全省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的相关数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改变许多地方数据不完整、不真实等沉痾病

疾，通过数据工作的常态化、常规化为科学决策提供扎实的信息基础。

存量与增量

在资源配置工作中，存量与增量的问题是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不得不承认我省在地区之间、城际之间的资源存量差距仍旧十分明显。面对优质学校、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对于优质教育资源吸附力更强的现实，如果我们对于存量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那么即便是那些在增量中被配给到薄弱地区或学校的师资等资源也极有可能在不久之后向优质学校集中。因此，割裂地看待资源的一次配置和二次配置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

资源配置应当更加突出薄弱地区和薄弱学校的优先选择权，力争在资源一次配置的过程中引导优质资源优先向薄弱地区和学校倾斜，从而不断缩小现有差距。在此基础上，校长和教师的轮岗等资源二次配置手段才能进一步缓解地区、学校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在资源的一次配置中给予弱势地位的地区和学校以充分的优先权是从根本上环节存量差距过大的重要举措。

动态与静态

长久以来，以寄宿制乡镇中心校为代表的农村学校建设解决农村学校布点分散、优势教育资源难以集中问题的重要思路。实际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资源配置的静态思路。许多省份不断出现的空壳学校的问题充分表明仅从静态的角度考虑资源的配置，显然无法应对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大规模和偶发性所带来的资源需求的急剧变动，从而导致资源的巨大浪费。

从动态的角度看待教育资源配置，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年龄较小的学生离家上学并不利于学生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分散布点的学校格局应当予以肯定。就发达国家和部分省份的经验可知，“学生不动教

师动”是一条值得借鉴的经验。以县为单位，建设流动教师资源库，借助校车将教师定期定点输送到相对分散的学校布点之中，不仅可以大大减少用于硬件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从而降低资源浪费的风险，而且可以充分发挥校车增开与停开的灵活性适应资源需求的瞬时变化。更为重要的是，县域流动教师资源库建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乡村学校教师招聘困难、编制不足等问题，消除在乡村从教教师对于家庭团聚、子女上学等问题的顾虑，从而更好地发挥教师从教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源合理配置不等同于硬件建设，如何实现教育资源的动态平衡才是资源配置的关键性问题。

孤立与合作

同其他省份相似，当前我省农村学校发展也面临两个共性的问题：一是乡村学校的文化扎根问题，二是资源配置总量不足问题。乡村学校的资源配置不是单纯设置一所座落在乡村的学校，而应当建设一所扎根于乡村的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就必须充分考虑如何同乡村文化建设相结合。

与此同时，文化部门等有关部门在乡村文化建设中投放的大量资源本应当在乡村文化建设中同学校形成合力。然而，事实是它们同学校系统之间往往并不存在必然性关联。在一些乡镇，乡村书屋、农科技术培训与学校资源建设之间相互独立。要改变这一状况，就必须打破资源配置中的条块分割，将乡村学校作为资源投放的主阵地，使得多个部门的资源可以有效集中于乡村学校，真正实现“三教统筹”，从而将乡村学校真正打造成为乡村文化高地，切实为新农村建设诸如文化活力。

资源的配给与效用

显而易见，资源薄弱学校并不因

成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并不能阻止广大爱国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意愿，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自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分别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坚决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号召收复失地、抗日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推动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城乡蓬勃兴起。九一八事变后，各种形式的抗日义勇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迅速遍布于东北各地，拿起武器英勇抵抗日本的侵略。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与国民党坚持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不敢发动人民群众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把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放在抗战重要位置。正是坚持了人民战争的思想，充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才能在敌后坚持抗战并获得巨大发展，到抗战胜利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从而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十四年抗战”概念，可以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人民群众在抗战中发挥的决定性作用，理解全面全民族抗战路线和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意义，理解抗日战争在促进中华民族觉醒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军事科学院。本文原载于《光明日报》2月7日第3版）

为了条件最好的教学大楼就能成为质量最高的学校。因此，资源配置不仅是“有没有”的问题，还是“能否发挥效用”的问题。

简言之，资源效用的发挥至少包括使用意愿和使用能力两个层面。资源效用的发挥依靠的不仅是教育工作者的学识和能力，也在于教育工作开展的文化环境。以往的教师、校长培训非常重视对于教育工作者素质和能力的提升，而这对于使用能力的提升的确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将配置到学校的电脑等教学设备充分运用到学校的教学过程中，的确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工作。然而，对于学校文化的整体改造关注不够将可能导致我们忽视“使用意愿”的问题。就笔者调研的情况可知，部分学校有一种安于现状的文化氛围。许多领导和教师并不愿意在教育工作中倾注更大的心血。资源的投放顶多是一种充门面、应付检查的“面子工程”，并没有对教学活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这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相一致，即知识与技能等方面的不足往往只是贫穷与薄弱的表层现象，真正的根源性问题在于文化观念。因此，真正做到教育资源效用的充分发挥，关键在于通过学校的文化建设营造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工作氛围，从而为配置到校的资源发挥更大的效用创设必要的环境。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建设的薄弱甚至缺失，才是资源配置效用发挥最为致命的问题，也是教育领域精准扶贫工作的关键所在。

总之，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复杂性与系统性，以资源的效用为旨归，打破条块分割，促成科研与行政、不同资源配置部门之间的合作，设置动态且灵活的资源配给机制，为全省各级各类教育的协同发展创设必要的条件保障。

（作者单位：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